

世界经济

趋同、相互 依存与分化

从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越来越少，但在短期内他们仍将共舞

凯莫尔·德尔维什

大多数人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融合的全球化世界。但是回顾最近的历史，谁能清楚地说出这种融合的性质是什么？似乎有三大基本趋势在发挥作用，而这三大基本趋势则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特征。





三大基本趋势

第一大趋势是新的趋同。已故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爵士在1979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讲道：“在过去的百年中，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增长率一直取决于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率。发达国家增长快，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也快；反之，发达国家增长缓慢，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也会放缓。那么，这种联动是不可避免的吗？”

最近的数据表明：这种联动仍然存在，但当前如何区分长期趋势和周期性变动是至关重要的。大约从1990年开始，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以可持续的方式加速增长，并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这在世界经济动态中是一项重大的结构性转变。

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基本特征是周期性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在过去的20年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长期趋势增长率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或“分离”，但这并没有导致该趋势的周期性变动发生脱钩。

新的趋同和强化的相互依存性同时存在于有关收入分配的第三大趋势中。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均等，尤其是高收入者所得的占比急剧上升。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获得的收入已增加了近两倍，约占美国总收入的20%（Alvaredo等人，2012年）。同时，虽然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两大集合体，两者之间的差距经过上述新的趋同已经缩小，但是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中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的收入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间几乎停滞不前（见“扩大还是缩小？”，《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

尽管平均收入趋于一致，但这两项事实使世界上最富有和最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新的趋同

在1990年左右，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趋同时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人均收入平均增长方面远远超过发达经济体。自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以来，富国和穷国之间明显分化的这一特征现在正在减弱。关键的问题是，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新的趋同很可能持续并导致世界经济发生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

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带来了巨大分化（Maddison, 2007年）。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叶，较富裕、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北半球”国家与欠发达“南半球”国家的平均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从3—4倍扩大到20倍以上（Milanovic, 2012年）。二战后，这种分化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而放缓，但在1950—1990年，相对平均收入差保持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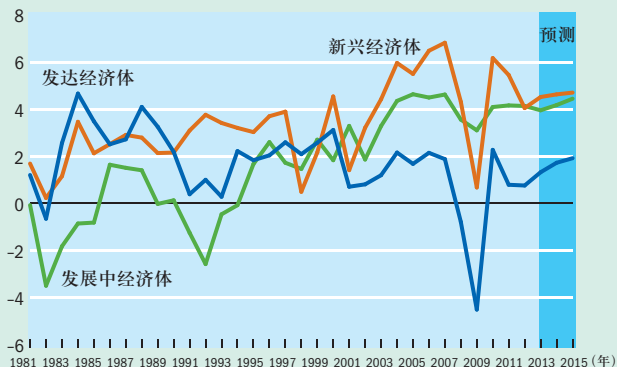
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虽然1997—1998年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但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三倍。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然后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世纪之交加速增长（见图1）。

图2显示了使用一种统计技术——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过滤器——计算的基本趋势增长率，它将周期性波动从长期趋势剥离出去。从20世纪90年代

图1
增长率和周期

在过去30年中，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有显著增长，但也存在很强的周期性变动。

（人均GDP增长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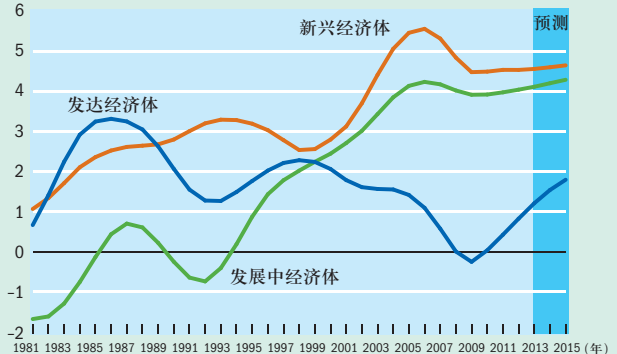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4月。

图2
持续性的差异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正处在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长期增长趋势中，尤其自世纪之交开始。

（人均趋势增长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IMF2012年4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数据的计算。

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趋势增长率和发展中国家在过去10年中趋势增长率的脱钩是显而易见的。

三个方面的发展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解释这种新的趋同。

首先，全球化——随着后来者引进并改进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并通过加强贸易联系和不断攀升的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促进了追赶型增长。当然，改进技术要比发明技术容易得多。

其二，多数新兴市场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口结构转型，伴随着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资本密集度增加而人均增长更快。同时，许多国家由于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最高峰，而由此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此相对的是，在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欧洲和日本，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显著。

趋同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收入投资的比例较高——在过去10年间，其占GDP的比例为27.0%，而发达经济体为20.5%。投资不仅可以使可用资金增加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采用新知识和生产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资本和劳动力的联合生产力，推动了从农业等低生产率行业向制造业等高生产率行业转移，加快追赶型增长。这第三个因素——较高的投资率——在亚洲尤其重要，而在中国则最为典型，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在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亚洲的趋势增长率不仅出现得更早，而且增长幅度也更大。

这种趋同会继续吗？预测总是有风险的，而且在过去的20年中导致趋同的一些因素可能很快就失去了效力。针对制造业而言，其追赶型增长的大部分已经实现，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行业的重新配置

也耗尽了其中一部分潜能；在一些国家中，虽然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很快，却没有创造多少就业，从而导致更大的劳动力份额从事着低生产率活动（Rodrik, 2011年）。

但是，我们所说的趋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趋同，而不是像有些分析那样，认为非常小的国家和中国、印度或者印尼等国家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总体上来说，至少在未来10—15年，更多追赶型增长的潜能仍然很大。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行业的再配置的速度可能会放慢，但在某些狭义子行业内，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公司向高生产率公司的再配置很可能以稳健的速度继续下去。服务业、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也可能有适应新技术的巨大潜力。除中国以外，在未来10年中，与“年老的”富裕国家相比，人口统计数据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更为有利。最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已经积累的极高负债率将限制其宏观经济政策，而投资也将放缓。

这种持续性的趋同，虽然速度上可能将会放缓，但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到2025—2030年，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大大接近于发达经济体，这也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以及本国货币可能实际升值。中国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而巴西和印度的经济总量将比英国或法国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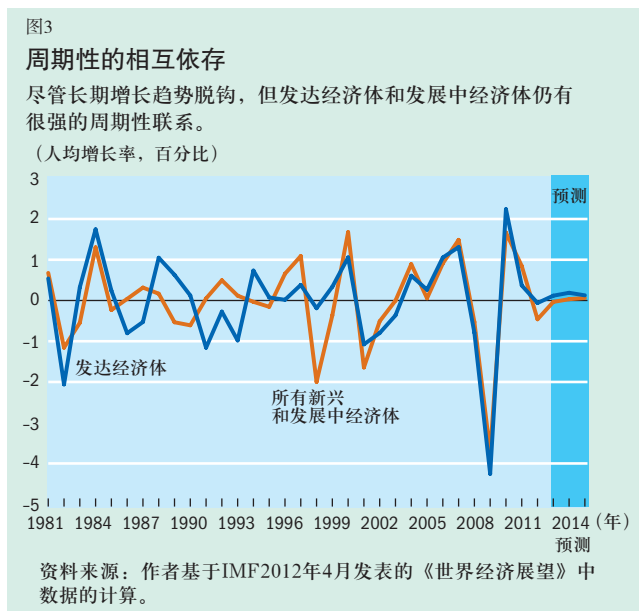
自工业革命开始的将世界刻板地划分成“发达经济体”和“贫困经济体”的方式将会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更加差异化和多极化的世界经济。

周期性的相互依存

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开始的2007年年底和2008年年初，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洲——看似飞速增长，且不受美国和欧洲的影响。随后便是2008年年底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带来的恐慌。全球经济显著放缓，甚至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这引发了人们的普遍担忧，认为这场始于华尔街的危机可能会导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崩溃。

全球经济的确在2009年放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增长率放缓至不到1%，而发达经济体则倒退了近4%。但前者迅速恢复增长，2010年增长率为6%而发达经济体为2.3%。在金融危机期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能力导致了对各国不同命运的全新认识。

图2显示了两组不同的趋势增长率：前者的人均GDP增长率是发达经济体的2—3倍，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图3表明在这一趋势中周期并没有这样的分化。特别是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出现



了周期性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Kose 和 Prasad，2010 年；IMF，2010 年）。相互依存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像中国这样的大宗原料进口国的经济增长或衰退，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出口有直接的影响。

世界经济仍然是相互依存的，国家的经济周期跨越国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发达经济体，主要是由于供应方面的因素，如



到2025—2030年，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将大大接近于发达经济体，这也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以及本国货币可能实际升值。

长期的资本积累、技术的追赶和人口因素。但围绕着趋势的周期性变动，与短期需求方面的因素关系更为紧密，很可能密切相关。2012 年年初，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滑坡，更多是因为宏观经济和财政部门的管理问题，而不是长期供应方面的因素，这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全球性的相互依存关系。

周期性的相互依存似乎有三大主要渠道。

首先是贸易。由于贸易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份额有所增加，因他国宏观经济发展而导致本国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有望增加。例如，一个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则通过减少对他国出口的需求而蔓延到其他国家。从理论上讲，如果贸易促使生产更加专业化，那么特定行业的冲击将趋于减少周期性的相互依存。但在实践中，宏观需求效应更为明显。

第二个渠道是通过日益全球化、巨大而复杂的金融市场。一份新的 IMF 报告衡量了“溢出效应”（即在当今经济中，由于巨大的贸易额和金融联系而导致一国政策对他国产生的影响），并证明了金融渠道的重要性。以欧元区为例，该报告得出结论，“来自欧元区国家压力的直接（与贸易相关）溢出效应是可控的，但是如果压力是来自于对欧元区银行的稳健性的疑虑，那么溢出效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也会很大，在许多情况下，会像雷曼兄弟破产后的影响一样大”（IMF，2011 年）。该报告还发现，在因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或过度杠杆化等原因导致财务状况吃紧的情况下，长期债券收益率的相关性要高得多，这表明金融渠道的实力取决于世界金融市场的总体态势。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反映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条件的相似性——也能通过金融机构的盈利状况和信用条件来影响经济周

期的联动性（Claessens、Kose 和 Terrones，即将出版）。

最后，相互依存似乎还有第三个渠道，可能与第二个渠道紧密相关，但不那么有形，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信心或者叫做“动物精神”，从而极大地影响金融市场和投资决策。有关美国次贷危机的新闻似乎仅仅通过散布“情绪”即可直接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信用违约掉期息差（Dooley 和 Hutchinson，2009 年）。

由于上述所有因素，长期增长趋势的脱钩与周期

性变动的持续相关共存，因为全球和区域因素将世界经济编织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

分配的分化

除了人均收入的广泛趋同和经济活动跨越国界的周期性相互依存以外，国家内部更严重的不平等以及世界最富有公民和最贫穷公民之间更大的差距似乎使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分化越来越大，这是最新出现的第三大基本趋势。在许多国家，收入都集中在极少数的高收入人群手中。除了这种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演变外，一些非常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没有增长，所以无法参与到上述的广泛趋同之中。

当然，因快速追赶型增长而产生的趋同效应影响到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一个快速增长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但是，各种因素（比如技术变革的性质、技能溢价的提高、全球市场的大幅扩张、在许多市场上出现的相关的赢家通吃现象、资本频繁流动而劳动力却相对固定——特别是非技术性劳动力，以及工会影响力的下降）都导致在许多大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的高收入人群手中。

与此同时，在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许多正在经历冲突和政府失灵，与 200 年前相比数亿人的实际收入并未得到大幅提高（Milanovic，2012 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经济有非常大的新的分化，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国家内部。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分配的两极差距已经扩大。

在许多国家里，收入最高的 1% 人口与其他人口

的巨大分化是新的现实。在美国和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收入最高的1%所获收入占比增加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情况在中国和印度，则不太明显。但从

未来的世界将更加多极化、相互依存度更高。

现有的数据来看，这种收入高度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是否为真实的全球现象尚不清楚。世界高收入人口数据库（Alvaredo 等人，2012年）显示，截至2007年，至少欧洲大陆和日本没有发生收入转移到收入分配最高的人口手中。但是因为引起这种收入高度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全球性的，国家政策只能抵消部分影响，所以这种头重脚轻的集中现象很可能将会而且只能增加。例如在德国和荷兰等国家，高管薪酬在过去10年中的增长非常迅速（Fabbri 和 Marin，2012年）。而且欧元区的危机以及相应的紧缩政策可能会导致欧洲收入状况更加不平等，因为预算的限制而削减社会开支，同时由于资本和高技能人才的流动性，难以有效地对最富有人群增税。

这种收入分配的新分化可能并不总是意味着国家分配的所有部分存在更严重的国民不平等性。然而，它确实代表了极少数人的收入集中性，并通过收入产生潜在的政治影响力，这可能会导致收入的集中度越来越高。产生这种动态的因素（科技、财政、金融、政治等）仍在发挥作用。

为了日趋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进行合作

世界经济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许多大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国家之间越来越大的相互依存度，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及国家内部和世界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这几方面的相互作用。这些趋势对政治、社会和地缘政治产生着影响，并将决定未来的政策讨论。

第一，在国际机构的治理中必须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日趋重要性，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有赖于此。全球的相互依存性要求加强机构设置中的合作，在机构设置中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占越来越大的比重。第二，上述的全球经济周期以及IMF最近证明的溢出效应，要求出台相互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后，在收入分配中的潜在不稳定趋势需要类似的国际政策协作，否则单一国家的再分配政

策将难以实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税基和税率必须是统一的，尽量减少逃税的可能，移民政策的管理必须同时兼顾东道国和来源国的利益。最后，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仍然是道德和政治上的需要。

未来世界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多极化和相互依存性，全球性的市场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潜能。这种潜能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合作如何提高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同时考虑到他们的溢出效应，以及在分配经济增长成果时如何鼓励增进平衡性和公平性。■

凯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s）是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兼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 Alvaredo, Facundo, Tony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accessed June 1, 2012. <http://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topincomes>
- Claessens, Stijn, M. Ayhan Kose, and Marco Terrones, 2011, "How Do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ycles Interact?" IMF Working Paper 11/8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Dooley, Michael, and Michael Hutchinson, 2009, "Transmission of the U.S. Subprime Crisis to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on the Decoupling-Recoupling Hypothesi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JIMF/Warwick Conference, April 6.
- Fabbri, Francesca, and Dalia Marin, 2012, "What Explains the Rise in CEO Pay in Germany?"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757 (Munich: CESifo Group).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October).
- , 2011, "Consolidated Spillover Report: Implication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Systemic-5" (Washington).
- Kose, M. Ayhan, and Eswar S. Prasad, 2010, *Emerging Markets: Resilience and Growth amid Global Turmoil*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ewis, Arthur, 1979, "The Slowing Down of the Engine of Growth," Nobel Prize lecture, Stockholm, December 8. 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9/lewis-lecture.html
- Maddison, Angus, 2007,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AD*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anovic, Branko, 2012, "Global Inequality: From Class to Location, from Proletarians to Migrants," *Global Policy*, Vol. 3, No. 2, pp. 125-34.
- Rodrik, Dani, 2011, "The Future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11 Jackson Hole Symposium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August 25-27.